

## 海昏侯墓“大刘记印”研究二题

王 刚

(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从汉代称谓来看,“大刘”之“大”,与彰显姓氏的显赫关联不大,它主要与年辈相关。汉代称“大”者,为父辈人物,印主刘贺为宣帝叔父辈,特制此印以隐约表达自己的身份。此外,此印有着“《春秋》笔法”,背后反映着武、宣时代的政治问题。具体说来,其一,“大”有大宗、正统的指向,由此,“大刘”隐隐有着争皇正统的考量;其二,“大”有昌大、兴旺及壮大之义,并与刘贺当年的封地及身体状况有重要关联。

**关键词:**海昏侯;墓葬;大刘记印

中图分类号:K234.1;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2-0020-07

### Two Topics About “Da Liu Ji Yin” in Haihun Marquis Mausoleum

WANG Gang

(Haihu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me in the Han Dynasty, the meaning of “Da” in “Daliu” was related to age and seniority, no correlation with illustrious surname. The appellation about “Da” was related to fathers in the Han Dynasty. LIU He, who was the uncle of Emperor Xuan in the Han Dynasty, expressed his identity and sincere feeling by manufacturing the stamp. Moreover, the stamp had “Spring and Autumn Style” reflecting the politics in the ear of WU and XUAN: (1) the meaning of “Da” was related to legitimacy; (2) “Da” was related to “prosperity”, “growth”, fief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LIU H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Haihun Marquis; mausoleum; Da Liu Ji Yin

2015年12月下旬,南昌海昏侯墓葬发掘进入关键时期。在对主椁室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在主棺附近发现了一枚刻有“大刘记印”篆书铭文的龟纽玉质印章,该印1.7厘米见方,制作精美。一面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猜测。作为出现在主棺附近的一方私印,本是关联着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的重要物证,但由于它没有直接出现墓主的姓名、官称等具体信息,再考虑到海昏侯家族所处的特殊地位及环境,我们很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通过此印,墓主及印主想表达什么呢?它有哪些历史背景及思想寄托?最近,笔者拜读了熊长云先生撰作的《海昏侯墓“大刘记印”小考》<sup>[1]</sup>(以下简称熊文),此文对该印作了及时和必要的考订,在感佩之余,感觉到还题有剩义。下面,就不揣浅陋,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收稿日期:2016-01-16

作者简介:王刚(1971-),男,江西南昌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史、古文献与学术史。

## 一、从“大刘”与秦汉的相关称谓问题看印主

“大刘记印”中的关键词是“大刘”。印主为什么要这样称谓自己？他是谁？与墓主是什么关系？背后有什么深意吗？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秦汉相关称谓的历史语境有所理解，如此，方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众所周知，海昏侯家族为皇族出身，作为刘氏宗亲，第一代侯刘贺还曾一度为帝。所以在“大刘”一词中，“刘”作为显赫的姓氏出现，以表明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是一望而知的事实。但是，“大”所指为何呢？就颇费思量了。就词义而言，“刘氏”之“大”，无外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姓氏的荣耀高贵；二是指年辈之高。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在讨论“大刘”问题时，熊文主要着眼的是这方面的含义，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海昏侯属于王子侯，所封者皆刘氏宗族，与印文刘氏相合。汉印中多有“巨+姓氏”之例。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巨李”“巨孟千万”等印。陈汉第《伏庐藏印》著录“巨董”“巨陈君”等印。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著录汉印“巨张千万”“巨董千万”。上海博物馆藏有汉印“巨蔡千万”。此外，亦有“大+姓氏”者，如《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大朱君”“大徐千万”等。“巨”“大”本可互训，扬雄《方言》：“巨，大也。齐宋之间曰巨。”目前所见冠以“巨”“大”等字的汉代印章，均属私印。而汉印称谓中仅包含姓氏，则表明称谓中的家族指向性。基于这样的理解，“大刘记印”应属私印，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又与上文所举汉印具有类似的一面。<sup>[1]</sup>

按照熊文的意见，在汉代私印中，常有以“大”或者“巨”冠于姓氏之前的例子，“巨”与“大”可互训相通，由此断定“大刘记印”属于私印。对于这些意见，笔者没有异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刘”之“大”，在语义上与皇族身份的相关度有多高呢？“巨”与“大”既然可互训，墓主又为什么不用“巨刘”的称谓呢？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巨”与“大”在称谓上是否有细微的差别？如有，它反映了什么？

翻检相关材料，诚如熊文所提示的，在汉代姓氏之前加“大”或者“巨”，乃是汉代私印中可见的一种事实。但细绎两《汉书》，在汉代，“大姓”的称谓极为常见。<sup>①</sup>“巨姓”之说则未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从“大姓”问题开始讨论。所谓的“大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地位占优的大家族，至少可以把持一方，成为地方实力派。但这种理念及事实，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所以，细绎文本，可以发现，“大姓”甚至“大族”的称谓，在《史记》中未见。《汉书·高帝纪下》所载的“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表述为“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我们知道，《史记》反映的是西汉中期以前的史事，其中既然无丝毫有关“大姓”甚至“大族”的概念表述，这就从侧面说明，“大姓”观念很大可能起于西汉中期以后，应是伴随着世家豪族的逐渐崛起而来。

而“巨姓”呢，在史籍中虽湮没不见，但有关“巨”的各种提法，在文献中并不鲜见。其中与本论题有关的，主要有“巨室”与“巨万”两个概念。先看“巨室”，这一用词，起于先秦，秦汉沿用。《孟子·离娄上》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赵岐注曰“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后汉书·仲长统传》云“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我们注意到，在先秦与汉代，“巨室”一词在所指方面微有不同。要言之，先秦之“巨室”，首要的体现，是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家族，是由“贵”而“富”，这就与汉代的“大姓”在语义上相近。而汉人所谓的“巨室”，主要表现为“琦赂宝货”“不能容”，是只见其“富”，未见其“贵”。

<sup>①</sup> 如《汉书》中，《赵广汉传》载“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酷吏传》：“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在《后汉书》中，《光武帝纪下》有：“郡国大姓”；《冯异传》：“郡县大姓”；《赵憙传》：“舞阴大姓李氏”等等。

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的商人阶层,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的“素封”阶层的崛起有所关联。也就是说,在西汉时代,“巨室”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被“大姓”一词替代,最后沦落为“富”而不“贵”的“土豪”,从而与“素封”最为接近。具体说来,西汉以来,就大族的兴起而言,有两个途径,一是政治权力,二是金钱财势。前者表现为由“布衣将相”发展而来的政治大族,后者则是凭借着经济实力而成为令人艳羡的“素封”阶层。这些“素封”之所以成其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说得直白点,就是有钱。他们以财势抗衡王侯,甚至一度使得“封君皆氏首仰给”<sup>[2](p1162)</sup>。而这些“素封”们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钱人的顶层呢?答案是千万(千金)及千万以上的“巨万”。《史记·货殖列传》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汉书·食货志上》则云“庶人之富者累巨万。”师古曰“巨,大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巨”冠于姓氏之前,多与经济上的夸富有关,如熊文所提及的“巨张千万”“巨董千万”,“巨蔡千万”,皆是如此。此外,在汉印中还有所谓“巨侯万匹”<sup>[3]</sup>之说,也是在经济上加以夸张。

要之,在汉代,“巨”虽有“大”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素封”的自称自夸。而习汉史者皆知,“素封”势力的兴盛主要在武帝之前,武帝后由于政治专制主义的加强,“素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单纯的炫富之风也由此不再,“富”附着于“贵”之上,成为常态。而这样一来,随着豪族强宗在西汉中后期的开始兴盛,“大姓”日益成为一种专称之后,只能表示富有的“巨”,大概就没有那么荣光了。例如,在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了一座“巨李钟”,学界一般都认为,这是李氏给墓主的赠赠品,“巨李”私印在汉代亦有发现,熊文中也有提及,并将其作为例证之一。黄展岳在相关研究中,曾论述道“巨李,即大族李家。”<sup>[4](p335)</sup>但笔者对此说法有所保留,理由在于,如果“巨”可与大族、大姓相通,怎么可以允许自己的姓氏成为他人的陪葬赠赠品呢?所以,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说汉初以来还可能“巨”、“大”之间差别甚微,随着“大姓”成为一种荣耀之辞,有政治身份的家族大概是不会以“巨”来命名自己的家族的。而海昏侯家族不管如何凋敝,毕竟属于皇族血脉,以“巨刘”自名的可能性较小。总之,要表示姓氏的荣耀高贵,“巨”不如“大”。

但问题是,有“大刘”就有“小刘”。倘从荣耀与高贵的角度来解读“大”的意义,那么,在汉代哪支“刘”又会属于轻贱之列呢?我们说,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归于伪问题,而且还触犯政治禁忌。以常理度之,在那个时代,刘姓与他姓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姓氏,作为高高在上的“国姓”,焉有“小”之理?熊文提出,“大刘”可“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但笔者以为,这种彰显大概是不需要进行的,因为它本来就彰显,无需特别提出。在那个时代,“刘”与“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刘帝”或“帝刘”,<sup>①</sup>是尊贵而不可平视的名辞。也所以,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收纳了那么多文字,作者之子许冲在给皇帝的上表中,很自豪地表示他父亲的这部书“莫不毕载”,但翻检此书,却恰恰漏了“刘”字,这绝不是疏失所致,而只能说,极大可能与政治忌讳相关,不可随意褻读。

也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大刘”之“大”,与彰显姓氏的显赫关联不大,那么,它就主要与年辈相关了。下面,来具体看这一方面的问题。

按照一般字义上的理解,“大”在年辈意义上有所关联的,一是年岁大小;二是排行。所谓年岁大小,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称“大”,反之则为“小”。当然更大一点,可以称“老”。恰如在今天的称谓中,年轻人可称“小王”、“小李”,年岁稍大,则可称作“大王”、“大李”,中老年人则唤作“老王”、“老李”。我们注意到,在汉代以至于魏晋以来的户籍管理及赋税征收时,就有“大”、“小”、“老”之别,“小”、“大”的身份,以15岁为界。<sup>②</sup>但在汉代,这种体现在年岁上的“大”,并不冠于姓氏之上,也就是说,“大王”、“大李”这样的称谓不能指个体。即便有,也是一种家族性的称谓,也即前所论及的,意在表现姓氏之显赫的一种称谓习惯。但由于刘姓的特殊,这一可能在前面已基本排除。而就排行而言,在一

① 如《汉书·王莽传下》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续汉书·祭祀志上》则有“帝刘之九”“帝刘之秀”的说法。

②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杨振红《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凌文超《走马楼吴简“小”、“大”、“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个家族的同辈人中,有所谓的大儿、小儿,大女、小女等的分别。在汉代则常常对应着“大男”、“大女”这样的概念,“大刘”有这个意思吗?没有。因为在这一语境中,“大”不冠之于姓氏之前,汉是如此,一般来说,汉以后也是如此。<sup>①</sup>所以,所谓“大刘”之“大”,与年岁大小及排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汉代在年辈上称“大”者,应该是什么身份呢?答案是父辈或叔辈。熟悉中国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宣帝时代,也正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所在的时代,有两对非常著名的经学大师,大、小戴和大、小夏侯,前者为礼学大师,后者是《尚书》学大师。其中大戴为叔父戴德,小戴为侄子戴胜;而大夏侯为叔父夏侯胜,小夏侯则是侄子夏侯建。<sup>②</sup>叔父以“大”冠之于姓氏之前,以示与小辈的差别。此外,在汉代的公主称谓方面,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姐妹则为“长公主”,姑妈则由于大一辈分,则称为“大长公主”,<sup>③</sup>也是沿用着这样的称呼习惯。也就是说,在汉代,“大”冠之于姓氏之前者,多为父辈人物。那么,“大刘”是谁,又是谁的父辈呢?他应该就是曾为皇帝的刘贺。习汉史者皆知,刘贺为武帝孙,宣帝则是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之孙,虽年龄差在一、二岁之间,<sup>④</sup>但刘贺却是宣帝的叔父辈。

由此,我们断定,“大刘记印”的印主就是刘贺,他在此印里隐去了具体信息,但又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身份,这既是出于某种政治忌讳的考量,同时也可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衡与宣泄。至于墓主,很大可能就是印主刘贺。即使不是,将此印收纳于主棺附近,也表达着自己对此印的珍视,它对自己的家族意义重大,有着内在的价值及意义。

## 二、“大刘记印”的“《春秋》笔法”与武、宣政治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崇尚儒学,诵读经籍成为了思想主潮。海昏侯墓主受时代风尚引领,也是一名爱好读书、崇尚孔子之人。在随葬品中,出土的两方砚台和两件有孔子画像的屏风,<sup>[5]</sup>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此,且不管墓主是否就是印主,也即刘贺本人,但他们所属的这个家族应该是诗书之家,是毫无问题的。而我们知道,在西汉经学氛围中,《春秋》作为“儒学中的显学”,<sup>[6][p99]</sup>作用最为突出。“《春秋》笔法”,或者也可以说,由此而来的“微言大义”的解经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那时读书人的思维。什么是《春秋》笔法?直白一点说,就是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言简意赅地表达心志,《左传》成公十四年论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要之,这种“笔法”总是将更多、更核心的信息隐于文后,《春秋繁露·精华》曰“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所以,在审读此类文本时,就不能仅仅就字面意思去加以直白理解,更要左顾右盼,用关联性思维去追问背后的意蕴。毫无疑问,在此风尚之下,海昏侯墓主及印主作为尊孔崇儒之人,在思想表达方式中,是少不了这种经学思维的。就本论题而言,这方“大刘记印”既然隐去了直接的信息,其实就是在作一种“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表述,从特定视角来看,这实质上是“《春秋》笔法”的别样呈现。那么,对于“大刘记印”的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称谓问题上,而应深入其后,找寻印主内心深处的表达,而这又必须深入到武、宣以来的政治场景中,才可能抉微探隐,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① 如在汉简中有“骊轩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次女□□□□□……”(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旧唐书·文宗纪下》则有“诏故澧王大男汉可封东阳郡王,第二男源可封安陆郡王,第三男演可封临安郡王。”

② 《汉书·儒林传·孟卿》载“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周堪》载:“(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后汉书·儒林传上·孙期》:“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汉书·艺文志》则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③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正义》曰“汉制,帝女曰‘公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姑曰‘大长公主’,仪比诸侯王。”

④ 刘贺旋立旋废,宣帝最终得立,这一事件发生在前后相续的同一时间段。关于刘贺的即位年龄,廖伯源在《昌邑王废黜考》中指出“《汉书·武五子传》谓宣帝地节三年,山阳太守张敞奏故昌邑王贺事,谓故王时年二十六七。地节三年(前67年)时二十六七岁,则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昌邑王即皇帝位时为十九、二十岁。”氏著《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页。而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死于黄龙元年(前49年)冬十二月甲戌,颜师古注引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寿四十三。”

笔者认为,尚结合武、宣以来的政治状况及海昏侯家族的命运发展,“大刘”一名绝不寻常,它至少应该有着如下两重含义:其一,“大”有大宗、正统的指向,由此,“大刘”隐隐有着争皇家正统的考量。其二,“大”有昌大、兴旺及壮大之义,并与刘贺当年的封地及身体状况有重要关联。

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含义。

我们知道,汉宣帝是以武帝曾孙的身份,在刘贺被废之后接续昭帝,成为新皇帝的。但由辈分而言,他与昭帝实为祖孙关系,在继承制度上属于非常态。由此,强调正统就成为了宣帝时代宣示合法性的重要课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中,武帝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接续武帝正统,于是乎成为了当时政治的核心所在。关于宣帝对于武帝的效仿推崇,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在《汉书》各篇章中,《郊祀志》曰:“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何武传》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王吉传》则有“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阎步克指出“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sup>[7]</sup>(p370)

宣帝能够接续武帝正统,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最大的资本就在于他是武帝长子一系的唯一后代。”所以他即位后,竭力为自己的祖父,也即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平反,<sup>[8]</sup>俨然以武帝的大支嫡传而自居。但必须指出的是,尚从武帝时代的政治规矩来看,这是很成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戾太子这一支原先虽然是嫡长子系统,为大宗所在,但按照武帝朝最后的政治定性,它却是被废黜的一支,而且还是大罪之族,最终满门被斩,宣帝是唯一遗留下来的幸运儿。要之,戾太子因巫蛊之祸而起兵,虽有冤屈,但毕竟发动的是一场兵变。所以武帝在晚年时,虽对此事有所反思甚至是深自悔恨,但终其一生,还是认定戾太子为有罪之身,一个“戾”字其实早就盖棺定论了。不仅如此,戾太子母亲卫子夫也由此受到牵连,在被废黜后自杀身亡,连谥号都没有,至宣帝即位时,才改封为“卫思后”。总之,不管如何平反或开脱,只要追寻到武帝时代,宣帝就是出于被废有罪之家,所以,他所看重的所谓大支或嫡传,实际上是经不得质疑的,要而言之,在武帝晚年,这一资格早被取消。只不过随着宣帝朝皇权的日渐加深,臣民们不敢旧事重提,发声反对而已。

那么,如果宣帝算不得武帝正统,谁才有资格担当呢?答案就是刘贺所在的海昏侯家族,至少在刘贺家族看来,他们最为合格。习汉史者皆知,武帝晚年,在重重疑云下,最终是八岁的幼子刘弗陵被立为了太子,不久,武帝驾崩,在霍光等人的拥立下,幼子登上帝位,成为了后来的汉昭帝,昭帝朝的合法性因此一度受到皇室及民众的强烈质疑。<sup>①</sup>昭帝以幼子得立,加之疑点甚多,时人的怀疑实属正常。因论题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讨论,仅在此提出两大相关问题:一是昭帝的合法性,刘贺本人是不以为然的;二是刘贺认为,不是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昌邑哀王刘髡才是真正的武帝传人。所以,据《汉书·武五子传》及《霍光传》,当刘贺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承大统时,本应以儿子的礼仪为昭帝居丧行礼,但刘贺不仅不如此,甚至连仪式性的哭都不愿意。而对自己的父亲,则以“三太牢祠”,“称嗣子皇帝”。

揆之于史,刘贺这种举动不是一时的任情而为,而是对过往历史做出判断之后的结果。习汉史者皆知,武帝在晚年最为宠幸的女人,是刘贺的祖母李夫人,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太了解的是,她还具有超高的政治地位——皇后身份。《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载“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也就是说,在卫子夫之后,是由她来坐在皇后位置上的。由此,李夫人的儿子,也即刘贺的父亲刘髡自然“子以母贵”,最应该成为太子,乃至后来的皇帝。然而,刘髡却在昭帝接位前后莫名地死去。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已很难明了,但前已论及,昭帝即位本就存在着质疑,刘贺家族怎么可能甘心接受这种事实与变故呢?所以,不管是居丧不哭,还是称“嗣子皇帝”,它所表现的,实质上是刘贺对昭帝皇位的不认可,及对父亲和自己家族的冤屈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之上,再来细绎“大刘”之名,隐然有深意存焉。在笔者看来,按照刘贺家族的逻辑,如果说“大刘”有大支嫡传的意义,那么,就接续武帝的正统性而言,昭帝为幼子得位,又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张小峰《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第二、第三节。

非出自皇后之门,得位不正,自然算不得“大刘”。而宣帝虽出自长子系统,而且祖父为皇后之子,但经过武帝晚年的变故之后,这一支早已成为了戴罪之家,失去了承接武帝正统的合法性。而唯有配食武帝的“孝武皇后”——李夫人的后嗣,才是真正的“大刘”之家,所以,我们由此就能够理解,刘贺何以敢自称“嗣子皇帝”。也所以,所谓的“大刘”,也就应该有刘贺蔑视昭、宣二帝,并进而否定宣帝接续武帝正统的同时,隐然自任为正统传人的内意向。

明了这一意义之后,再来简单地看第二个方面的含义。

我们知道,刘贺本为二代昌邑王,海昏侯家族对这一身份,看起来是极为重视的。根据本次海昏侯考古发掘的相关报道,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此外,有大量书写“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在一件青铜豆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sup>[9]</sup>这说明,刘贺家族对于当年的“昌邑”情有独钟,或者也可以说,“昌邑”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情结和逝去的美梦,是念兹在兹的东西。

就字义来看,“昌”有着大且美的意思,常作为一种吉祥用词而出现,“昌邑”,且大且美的封邑,这样的观念,在字义上应该是能够成立的。而来到海昏,可能会更加深这一心理认知。我们知道,先为县后为侯国的“海昏”就字义而言,指的是鄱阳湖以西。“海”应该是比喻那片辽阔的鄱阳湖水域,“昏”则借太阳西下的黄昏来代指西面。然而,在经籍中,“昏”又有早死之义,《左传》昭公十九年载“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预注引贾逵言“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孔颖达疏曰:

夭为少死也。《尚书》六极,一曰凶短折。孔安国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为早死之名,故为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谓未三月而死也。总说诸死,连言之耳。

刘贺应是熟读经籍之人,对此当然是熟悉的,并理所当然地有所禁忌。在厌嫌“昏”的同时,且大且美的“昌”就更加使其追念不已。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据《汉书·武五子传》,刘贺在海昏曾属意于被封为“豫章王”,除了地理条件的便利之外,“豫”与“章”也有大且美的字义指向。此外,当“昌”被用于形容人的时候,还可与身体的高大修长发生联系。如《汉书·儒林传》记有“申章昌曼君”,颜注引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我们知道,“曼”有修长美丽的意思,与“大”可通,并与“昌”意义相近,故而被用之于有连带关系的名与字之中。不仅如此,作为符合汉人审美标准的名词或概念,“长大”或“壮大”既悦人耳目,同时也是一种帝王气象。《汉书·外戚传上·孝武钩弋赵婕妤》曾载昭帝幼时之事,其中这样说道“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师古曰“壮大者,言其形体伟大。”而据《汉书·武五子传》,昭帝驾崩后,群臣一度属意于广陵王刘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壮大”,而刘贺本人也被记载为“身体长大”。总之,“昌”与“大”之美有着关联,而刘贺又是“身体长大”的“昌邑王”,他命名“大刘”之际,既有对海昏的抵触,同时又饱含着各种复杂微妙的心情。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再来审视海昏侯墓葬物品,就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随葬品中的柿蒂纹纹饰。作为海昏侯漆器中最常见的花纹,有专家指出“柿蒂纹是这批漆木器纹饰运用的主要造型,还有许多种变体花纹,绘出了很多抽象图案,但它们的母体都是柿蒂纹。这也意味着,西汉海昏侯墓的标志,也可能会采用柿蒂纹。”<sup>[10]</sup>这样一个汉代多见的文饰,按常理本无足深论,但在海昏侯墓葬中如此多地出现,乃至可谓标志性纹饰,内中就没有深意吗?我们以为,有。因为海昏侯所处的特殊景况,使得这个家族在抑郁之下,有太多需要含蓄表达的内容。所以考察海昏侯墓葬,既应以常理度之,更应跳出常态之外来看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柿蒂纹问题上来。“柿蒂”是后来的俗称,并不雅致,对于刘贺家族来说,当以其雅名为规准。据李零的考订,柿蒂纹的本名应为“芳华纹”,其基本根据,是战国镜铭中的“芳华蔓长,名此曰昌”。而且他还指出“‘芳华’屡见于古代诗赋,不胜枚举。如屈原《楚辞·九章·思美人》:‘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sup>[11]</sup>我们注意到,此一论述中有两点特别关键:一是此纹饰“名此曰昌”,明显指向了“昌”,并联带有“蔓长”等与“大”相关的词汇。海昏侯家族借此关联,寄托出“昌邑王”、“大刘”的意义,应非臆说。二是此纹饰与美人相关。就本论题而言,最重要的美人,那就是李夫人了。据史书

记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痛惜不已,曾作《悼李夫人赋》而寄托无尽的哀思,此赋收录于《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中,其中“惜蕃华之未央”,“芳杂袭以弥章”云云,恰与“芳华”意境相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柿蒂纹在海昏侯墓葬品中应该有着特别的寄托。而进一步言之则是,这一寄托不仅隐隐表现了海昏侯家族为“芳华美人”之后,更是正统所在,是“名此曰昌”的荣耀一族,这一族本应高居皇位,但现在却沦落于此。由此,它与“大刘记印”正可相互映证,反映出刘贺及其家族不满与哀痛的情愫。

当然,关于“大刘记印”应该还有更多的信息隐于其后,如它的龟纽是否有隐含的深意?与它一起出现的玉具剑,还有未刻字的玉印,它们相配套在一起,这些是否有着早期宗教信仰或仪式性的内容呢?由于篇幅及材料所限,本文不再论及,仅就以上两方面提出自己的浅显意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 参考文献:

- [1]熊长云.海昏侯墓“大刘记印”小考[N].中国文物报,2015-12-18(6).
- [2]班固.汉书·食货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裘锡圭.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N].中国文物报,1989-01-20(3).
- [4]黄展岳.关于武威雷台汉墓的墓主问题[A].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C].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 [5]张力文,徐蕾.海昏侯墓再次出土“孔子屏风”[N].南昌日报,2015-12-01(2).
- [6]赵伯雄.春秋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7]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8]崔建华.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的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说起[J].唐都学刊,2010(2).
- [9]徐蕾.万件珍贵文物重现天日创造考古史多个第一——揭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重大考古发现[N].南昌日报,2015-11-05(5).
- [10]张力文,徐蕾.海昏侯墓主卧室开棺大猜想[N].南昌日报,2015-11-12(5).
- [11]李零.“芳华蔓长,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7).

(责任编辑:戴利朝)